

学术主持人语

由于地理邻近,东北亚各国之间人与物频繁流动,语言、思想、文学、艺术也不断地交汇、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空间。本栏目以“东北亚区域文学”为主题,首先是因为此一区域的文学资源丰富,有很多充满魅力的课题可供研究。其次,强调以“区域文学”为研究单位,也可在通行已久的“国别文学”与“世界文学”二元相对的研究框架之中,增加一个新的参照,从而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区域文学研究也是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本栏目的论文,以从原文文本入手分析为基本原则,同时注重考察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脉络中的移动和转换,且努力尝试把文本放置于区域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开放式解读。

——王中忱

语言·经验·多义的“现代主义”

——以北川冬彦的前期诗作为中心

王中忱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84)

摘要:日本“现代主义诗”的特性曾长期被狭义地理解为语言形式的实验性,本文则认为应该在与社会历史的广泛而复杂的联系中重新定义“现代主义”,并以此为前提,重新考察诗人北川冬彦的前期诗作,分析了她的“艺术左派”立场与“帝国日本”殖民扩张行为的紧张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北川诗法”的“前卫性”,同时也指出了殖民地生活经验对北川诗作的束缚和限制。

关键词:现代主义; 殖民地经验; 北川冬彦; 艺术左派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948 (2013) 03-0002-07

一、“现代主义”的再定义与北川冬彦的意义

近些年来,由于后殖民批判论述的触动,日本文学研究者也努力突破仅仅以国家边界为范围的文学史格局,把目光投向“帝国日本”时期的殖民地,考察“帝国主义时代”状况下文学的“越界”的行为及其轨迹。由生活在殖民地城市大连的年轻诗人安西冬卫(1898-1965)、北川冬彦(1900-1990)等创办的《亚》杂志(1924年11月-1927年12月,总35期),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特别提起的。由于该刊被视为“日本现代主义诗的原点”(川村湊,1990: 64)或“日本诗的现代主义燃火点”(西原和海,1996: 246),自然也被放在“现代主义”的谱系上进行讨论。如所周知,以往研究所认定的包括《亚》在内的“现代主义诗”的特征,主要是其诗体形式的实验性和前卫性,而现在“现代主义诗”则被考掘出了与“帝国日本”殖民历史的种种联系,自然无法继续保持外在于社会政治的语言自足体的面貌^①。在这样的讨论中,爱理思俊子(エリス俊子,1994: 545)的《重新定义日本现代主义》

提起了深具理论内涵的问题。该文强调“从世界史的脉络”上考察“日本的现代主义”,但不赞同将其视为“从西方直接输入”的“特定的运动”,而是主张把“日本的现代主义”作为“日本独自的历史脉络中的产物”重新进行检讨。该文甚至认为,在此意义上,继续使用在近代诗歌史上被赋予了特定意义的“现代主义”一词已不合适,更恰当的称呼应该是“日本的近代主义”。尽管因为约定俗成,我们不得不继续使用“现代主义”。

爱理思论文提起的问题,放在日文的表述里应该更好理解,因为在日文里,“现代主义”是以片假名「モダニズム」标记的modernism的发音,让人一望便知是外来词或翻译词。该文建议以汉字书写的「近代主義」置换以片假名书写的「モダニズム」,既是为了清理“近代诗歌史上”赋予给「モダニズム」的“特定意义”,具体说,就是清理此概念被给定的外来性、自足的语言实验性、高蹈的前卫性等狭义色彩,同时也是为了呈现出所谓“现代主义诗”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

作者简介:王中忱,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中日近现代文学、东亚区域文化关系史。

历史的复杂关联，这无疑是一个具有理论生产性的提议。沿着这样的思路，重新回溯以往日本近现代诗歌史研究，其实也可以找到有效的学术资源。比如，1950年代初期，著名诗人伊藤信吉（1954：406-407）以“现代诗鉴赏”的方式，系统整理明治至二战以后的诗史时，尽管当时用片假名标记的狭义的「モダニズム」概念已经开始流行并成为颇具权威性的文学大系的分类标准^②，他却使用汉字词汇的“近代”、“现代”作为分类概念，并坚持认为，推动“现代诗”成立的主要动力，既来自“从艺术革命的立场出发”的“前卫运动”，也来自“植根于思想革命的文学运动”，特别是“具有一定阶级性格的无产阶级文学”。伊藤认为：“现代诗”之不同于“近代诗”之处，“首先体现为强烈的诗的表现和对音乐性的否定，此外，则体现为强烈的叛逆倾向”。总之，伊藤把“艺术革命”和“思想革命”都视为诗的“现代性”得以成立的必要条件。而如果从反叛“近代”传统的意义上可以把伊藤所说的“现代诗”称为“现代主义诗”，那么，他的“现代主义”显然是更为广义、多义和开放的。正是在广义的现代主义脉络上，伊藤对诗人北川冬彦从探索“形式革命”进而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关注”、由“艺术左派的立场跨越到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成员”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北川是“从艺术革命向革命的艺术，唯一一位经过这样的阶段提高了自己”的诗人^③。

但本文把北川冬彦作为主要讨论对象，却不是因为他曾经得到的高度评价，而是因为他的被贬抑。伊藤信吉所说北川冬彦由“艺术左派”向“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跨越，明显表现在他参与《诗与诗论》（1928.9-1933.12，含该题为《文学》时期）期间。这本杂志曾长期被视为狭义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据地，但事实上，该刊创刊之后的一段时期其实是众声喧嚣，表现出了多种取向。如北川在该刊译载布勒东（1896-1966）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着眼点主要是其中的“最为伟大的精神自由”和“想象力”^④，他把“超现实主义”解释为“与精神相关的世界”^⑤，并从《诗与诗论》创刊号到第7号，先后发表《战争》、《毁灭的铁道》等具有鲜明社会批判性的诗作，无论是诗学探求还是写作实践，都与该刊的主要编者春山行夫（1902-1994）所主张的“无意义的诗”大异其趣。如泽正宏（1994：13）指出的那样，此时的北川已经“超出了拘囿于形式的狭义的现代主义”，所以，他对《诗与诗论》的形式主义倾向深感不满。1930年4月，北川和三好达治（1900-1964）等退出《诗与诗论》，另外创办《时间》（1930.4-1931.6）、《诗·

现实》（1930.6-1931.6）杂志，开始了另外的探索。

从参与《诗与诗论》到创办《时间》、《诗·现实》，此一期间北川写作的诗，主要收在《战争》和《冰》这两本诗集。这些诗作和北川1923年开始写作以来的作品，无论在主题还是语言表现上，都既有连续又有跨越性发展，在北川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可以算作前期，当然也不妨把这个“前期”再细致划分出一个“早期”。北川的《战争》等诗作所做的探索，曾得到同时代作家梶井基次郎（1901-1932）、横光利一（1898-1947）、三好达治等人的好评，梶井称赞北川对诗歌变革的努力，说他“始终站在此运动的前端战斗”，并认为，收在《战争》里的“《战争》、《大军叱咤》、《毁灭的铁道》、《鲸鱼》、《腕》”等作品，明确显示了他目前所展开的新观点。这即是阶级。这是《战争》所具有的最重要的意义”^⑥。二战以后，北川的《战争》等诗作中所表现的对军国主义的批判意识，仍然得到如伊藤信吉等诗史研究者的重视，但随着把“无产阶级文学”排除在外的狭义现代主义论述成为主流，北川的“艺术左派”立场及其颇显异端的现代主义诗歌实验，也逐渐成为被贬抑的对象。如诗人大冈信（1953：21）便曾严厉批评北川的诗集《战争》，称“在这里，决意与所有因循守旧思考绝缘的超现实主义精神已经消失，前卫一词在此已经毫无意义”。直到1990年代，藤一也（1993：80）还认为：“北川《战争》以后的意识形态式的社会意识，反而成了他的作品的束缚”，并说这是“战后诗拒绝正面评价北川”的最重要原因^⑦。

诚如樋口觉（1996：112）所说，有关北川冬彦的评价问题，其实是“牵涉到近代诗史的叙述”的整体性问题，因此，比起北川评价的高低起伏，本文追问的主要是这种评价落差因何而来，并想特别指出，那种有意切断诗与社会历史关联的狭义现代主义论述自不必说，即使是从社会·思想革命的角度对北川给予高度评价的论述，涉及到北川的诗作与其殖民地生活经验的关系，也大都语焉不详或过于抽象，而这恰恰是考察北川前期诗作、分析其特点（无论是其优点还是其局限）、并对其多义性文本进行开放式解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视点。

二、开放与闭锁：非均质的殖民地空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从日本现代主义诗与“满洲”殖民地关系的角度谈及北川冬彦时，几乎毫无例外地会把他和安西冬卫放在一起讨论，但如果考察一下两人在“满洲”的足迹，则可以看到，1919年21岁的青年安西冬卫到达大连并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五年的“满洲”生活

时,恰恰是19岁的青年北川冬彦结束了十二年的“满洲”生活,前往“内地”也就是日本国内求学的开始。这似乎偶然的交错,其实鲜明地表现了两人生经验特别是殖民地生活经验的差异。换言之,北川和安西虽然都曾置身于“满洲”,且为《亚》杂志的同人,但他们在殖民地“满洲”的体验却不相同,不宜一概而论。

根据北川冬彦的年谱和传记资料^⑧,1907年,当时名叫田畔忠彦的北川^⑨,随着父亲与家人到达“满洲”时,才刚刚7岁,来前他正在滋贺县的大津小学一年级读书。不必说,来异国之地,并不是出自他自己的意愿,而是被父母携带而来的。北川的父母双方家庭共有的一个特点,就是都与铁路关系密切。北川的外祖父出身士族,曾任滋贺县大津车站的站长,而他的父亲田畔勉虽然出身福井县农家,却没有务农,而是成了一个铁路技术人员,在官设(即国有)铁路上任职。

如所周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铁路建设作为国家“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战略的重要环节而被大力推进,并借甲午战争获胜之机实现了大发展。日俄战争之前,日本铁路已在国内形成了完善网络,并侵入了朝鲜半岛,“在日俄开战迫在眼前的1903年12月28日,京釜铁道速成敕令颁布”(原田胜正,1981:8),开战三个月后,1904年5月,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机构“大本营”又在东京组建“野战铁道提理部”,并将其派往已经成为战场的“满洲”。北川的年谱曾简略记述到其父田畔勉“在日俄战争时作为野战铁道队员奔赴满洲”一事,其中所说的“野战铁道队”,确切说应该是“野战铁道提理部”。据原田胜正(1981:7)研究,“野战铁道提理部的本部领导,是由工兵、会计、军医的将校构成的,技术部的领导,则由铁道作业局(当时官设铁道的现场作业机构)的技术人员及事务人员构成。总工程师古川坂次郎在甲午战争时曾隶属大本营负责军事运输,其后则以八王子出張所所长身份主持八王子至甲府之间的铁路建设,在笹子隧道等工程上因采用近代新式施工方法而引人注目。在古川之下,设有庶务官及运输·火车·工务·材料各科”。而据樱井胜美(1984:13)的考察,北川冬彦的父亲曾“作为笹子隧道开工事的监督亲临现场”,综合这些因素,可以推测,田畔勉是在古川坂次郎的人脉上进入“野战铁道提理部”的。这个所谓“野战铁道提理部”,是以修筑战时军用铁路为目的设立的机构,其行动路线,一条紧随从大连登陆的日本军队,改筑刚刚抢夺到的俄罗斯东清铁路,组装从日本运载来的车辆,另外一条,则随同日本军队从朝鲜半岛北部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领土,铺设从安东(今

丹东)到奉天(今沈阳)的军用轻便铁路(原田胜正,1981:21,27)。北川冬彦的父亲是沿着哪条路线行动的,无法确认,但肯定是随着战场的推移而移动的。“野战铁道提理部”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日俄战后设立的日本国策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般简称“满铁”)的母体,北川的父亲在战后立刻成为“满铁”的社员,自然是不奇怪的。

结合上述背景,可以说,北川冬彦一家,是伴随着“帝国日本”的对外殖民扩张来到“满洲”的,但幼年的北川和野战铁道队员的父亲的感觉,应该有所不同。北川一家到“满洲”后的最初住所,是一个叫“得利寺”的地方。樱井胜美曾对当时的此地情形做过如下描述:

得利寺是南满铁路沿线上位于大连以北一百五十公里的一个小站。……只有和满铁有关的四、五家住房,学校自然是有的。上学,只能到有一个小时火车车程的瓦房店去,但在他上下学的时间段,没有在得利寺停车的客车。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经过父亲的安排,请在上下学时段经过得利寺的火车放慢速度,他朝着车尾乘务员踏立的地方,去时跳上,归时跳下,就这样极其危险地进行跳车走读。满洲之秋短促,冬将军早早来临,火车头的车轮之间,“油冻住了,宛如碎石”(北川诗作《冬》里的诗句),即使在这样凝冻了的严冬,他也一直跳车走读。对于小学一年级学生来说,这是过于严酷的走读。

(樱井胜美,1984:16-17)

翌年(1908),北川因父亲工作调动而转到奉天以北的铁岭小学,1909年春,又随着父亲转到安东,从小学三年级直至毕业,都是在这座与朝鲜半岛一江之隔的小城里读过的。如此的辗转移动,北川很像是在重新体验父辈“野战铁道队员”的经验,而需注意的是,北川的移住之所,都在“满铁”的附属地内。日本通过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地区攫取的殖民地,是由包括旅顺和大连在内的“关东州”、南满铁路及沿线的“附属地”构成的,这些附属地究竟应该视为“租界”、“准租界”,还是“铁道居留地”^⑩?这在当时即有争论,但以日本的军事力量为背景,“满铁”实际掌握着附属地的行政权和经营权,则是不争的事实。在满铁附属地,日本人和“外国人”(主要是中国人)杂居生活,但实际上是分区居住,一般是日本人住在铁道南侧,中国人住在铁道北侧(李百浩,1997)。附属地里设有日本人小学,和日本国内小学施行同样的教育。也就是说,尽管铁路和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

构成了便于人与物频繁流动的网络，但在附属地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隔离着的。

当然，即使同为附属地，状态也并非均质的，其中既有像得利寺那样荒凉至极的小站^⑩（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1929），也有安东那样的港口城镇，或位于长春、奉天等都市中心的某些地段，但不论在哪里的附属地，日本人自己聚居的封闭式空间结构则基本没有变化。1913年4月，北川冬彦进入旅顺中学，在所谓“关东州”的军港一住就是六年，他经常往返于旅顺和大连之间，大连成了他探望家人的省亲之地。而此一时期在大连居住的日本人已经达到三万人以上（大连日本民生署，1928：5-6），比起满铁沿线的附属地，自然更容易形成日本人自己的社会空间。

在此还应补充说明，1914年至1915年间“满铁”颁布的教育方针，曾把培养“开拓型国民”、树立“殖民思想与在殖民地永住的意志”作为重要条款，而此前颁布的《附属地小学校规则》（1908），也在遵从日本国内的《小学令》（1900）相关规定的同时，把“清国话”（汉语）放到了外语选修科目里（谢忠宇，2009）。但考察北川冬彦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经历，却看不到有学习汉语的迹象。如前所述，1919年3月，他从旅顺中学毕业，同年9月，升入位于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很显然，这位在“满洲”成长起来的青年，并没有养成在殖民地永住的意志，而是把日本国内的帝国大学，当作了自己追求的目标。

三、作为“帝国”隐喻的军港、铁路和身体

北川就读的第三高等学校文科丙类的特点之一是以法语为第一外语，1922年4月三高毕业后，他升入东京帝国大学，选择了法文法律专业，据说是服从了父亲要他将来在包括满铁在内的政府所属机构任职的愿望。但在此年的年底或翌年年初，由于旅顺中学时代的同学城所英一、富田充的劝诱，北川终于参与同人文学杂志《未踏路》的活动，并在1923年暑假回大连省亲时举办了诗歌展览会，以此为契机和安西冬卫结识，一起创办了《亚》杂志。北川冬彦作为诗人的生涯，就是这样在共同拥有殖民地生活经验的友人们的推动之下开始的。

1924年年初，北川和富田充、城所英一在东京另外创办杂志《面》，作为《亚》的同人，他们的名字从第3号开始消失^⑪。这一事件曾被说成是《亚》诗社的内部分裂，但实际上《面》的同人归省大连，仍然参加《亚》

诗社的活动，也时而为《亚》杂志供稿。1928年初，供职东京一家名为厚生阁的出版社的春山行夫筹划创办《诗与诗论》杂志，开始物色同人时，北川冬彦便向他特别推荐了“在‘满洲’大连刊行了一个小杂志《亚》的意象派诗人安西冬卫、瀧口武士”^⑫。因此，安西和瀧口在1927年12月《亚》停刊不久，即成为了东京大型诗杂志的同人。

由于游走于“外地”和“内地”之间，北川推动了两地“现代主义”诗人的合流，而他的诗歌写作，也具有“两地”交错的特点，比如他的第一本诗集《三半规管丧失》排在前面的几首诗作：《共同便所》、《瞰下景》、《街里》、《三半规管丧失》，便是基于其亲历的1923年9月1日关东大地震经验写出来的。且看其中颇为著名的《瞰下景》：

从高楼顶上向下俯望
电车·汽车·人都在蠕动
眼珠好像粘到了地面上。

（北川冬彦，1925：5）

北川（1968：9）曾回顾道：“是关东大地震给予我的冲击，使我的诗脱离了习作阶段”。同时又特别强调：“虽然在震灾中受到巨大冲击，但我没有写过一首震灾风景的诗。”北川（1968：10-11）把这种“有意回避照着现实原样进行描写的方法”称为“新现实主义的方法”，认为这在自己早期诗作已经有所体现。并说：与此同时，“比起语言的音律，更为重视映像，重视鲜活的日常语言所蕴含的实感”等后来自己“奉为诗歌写作指针”的内容，从早期诗作也可窥见端倪。很显然，北川之所以把这几首诗放在第一本诗集的前面，并不仅仅是按照写作时间排序，更重要的是认为这几首诗作体现了自己后来明确意识到了的方法。而从上面引录的《瞰下景》，确实可以看到“北川诗法”的独特性。在诗的文本里，语言表现主体由高层楼房向下俯瞰的视点，同时受到地面引力的强烈牵引，造成了一种巨大的眩晕感。如果想到高楼大厦是明治日本强力推进的“近代化”的产物和象征，那么，这首短诗所凝缩的意蕴，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对震灾感受的描摹，其实包含着对日本“近代”的反思和批判。这在诗集的标题也有所表现，“三半规管丧失”，本来指的就是人的感官失衡，这可以说是北川这本处女诗集的基本主题。但该诗集里很少几首容易让人联想到“满洲”风景的诗作，如《落日》、《冬》、《喜悦》，虽景象荒漠，情调却颇静谧。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对于此时的北川来说，殖民地大连似乎还属于生活与精神的避风港。

1925年3月，北川大学毕业，父亲希望他到满铁就职的书信不断寄来，他却不为所动，而是办理了转入法国文学科的入学手续。对北川而言，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选择，意味着他已经绝意不走当时帝国大学政法科系精英分子的出世之路，而把自己自觉放到了社会的边缘（桜井勝美，1984：168）。同年8月北川回大连，一直住到1926年3月，他的第二本诗集《体温计与花》的很多作品，据说都是此一期间写下的（北川冬彦，1951：317）。

在《体温计与花》里，以“满洲”风景为题材的诗作明显增多，但文本里语言表现主体的目光明显变得严峻，如《平原》：“炮击/落日如镜在平原上泛滥”（北川冬彦，1926：29）。其动荡不安的“满洲大陆”意象，显然是对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各种媒体刻意塑造出来的“满洲夕阳”意象^⑥的有意颠覆。再如《古战场》：“黑色的山体悄无声息地裂开新月升起/蝎子在山腰竖立起冷酷的吸针/是产铁的山”（北川冬彦，1926：26）。如果了解“满铁”自1918年起便在鞍山建立制铁所的历史，不难想见，此诗指涉的是日本在“满洲”殖民地的掠夺行为。由此可见，北川冬彦在以实验性诗法和国内的即成诗坛对峙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和“帝国”进行政治对峙的姿态。

北川对帝国日本的殖民主义扩张行为的批判意识，最为鲜明地表现在他参与《诗与诗论》时期的诗作，其中的代表作都收入了诗集《战争》里，在此引两首为例。

鲸鱼

巨大的鲸鱼漂浮上来了，海峡瞬间就被毁灭。
无辜的海峡。不，不。被矫正方向的方向。恶，
已经存在于巨大鲸鱼浮起之处。对海峡的记忆。
这也是宏大的恶之所为。

巨大的东西，那皆为恶。那就是恶。

（北川冬彦，1929c：120）

毁灭的铁道军国铁道在冻结的沙漠里种植下无数牙齿，无数长钉的牙齿。突然，一个凝固的街市出现，在飞鸟绝迹的灰色凝冻沙漠里。围绕着蛹虫般的有轨列车，街市的构件一一汇聚而来，犹如垃圾，比如，烂了眼角冻僵腿脚的卖淫妇。一列列火车里牢固树立起来的阶级之墙。铁道正是在人的痛苦中完成的。人的手臂在枕木下变形，那比一片枯叶离开树干还要简单。铁路完成，街市消灭。人群立刻如蚂蚁一般散去。沙漠恢复了沙漠，留下了一条伸向星空的伤痕。不久，军国

擦拭去这条伤痕，巨大手臂继续向前伸展。

朝着毁灭。

（北川冬彦，1929b：118）

在《诗与诗论》时期，北川冬彦（1929a：258—259）开始提倡“新散文诗”，在《通往新散文诗之路》一文里，他首先强调：“把‘新散文诗运动’视为‘诗的散文化’是不恰当的”，认为“新散文诗”是“真正的自由诗”，并进而阐述道：“今天的诗人，绝不再是灵魂的记录者，也不再是感情的流露者。”、“他是以敏锐的头脑，对无数散在的语言进行周密选择、整理并将其筑为一个优美结构体的技师”。如果仅从这些言辞来看，北川的“新散文诗”主张似乎比较偏重于语言的结构或诗的语言形式，但在《诗人之眼》一文里，北川（1929d：33—34）又补充说：“这种诗的形式变革，同时也变革诗人的精神。新的诗人舍弃韵文精神的行为，就是诗人的社会性自觉”。把这两篇诗论相互对读，可以了解到，北川认为当时的普罗诗歌过于倚重“素材”，而他自己则不想仅凭“素材”取胜，在上面引录的两首诗，北川虽然选取了重大的社会题材作为表现主题，但同时也在探索新的语言构成方式，他其实是努力在二者间寻求平衡。

《鲸鱼》和《毁灭的铁道》都选取了可以作为殖民扩张象征的意象，并将之予以强烈的表现。《鲸鱼》以毁灭海峡的“鲸鱼”让人联想起军舰，而“恶，已经存在于巨大鲸鱼浮起之处”一句，在表明作者对帝国扩张欲望的毫无忌惮的大胆批判同时，以具象的“鲸鱼”意象与抽象的“恶”之概念进行对比，也收到了特殊的语言表现效果，并为结尾处批评情绪激越的诗行做了铺垫。《毁灭的铁道》明显具有叙事性，应该是北川“新散文诗”的代表作，而在比喻方法方面，也有值得特别注目之处。起始一句“军国的铁道”，不必说是“军国”的产物，也是“军国”的隐喻性表象，而这“铁道”上“无数长钉的牙齿”，是“枕木”的暗喻，自然也“铁道”形成了邻接性的“换喻”关系，又与侵入殖民地的“军国”的侵略意象相呼应。诗中的“手臂”一词无疑也具有多义性，“人的手臂在枕木下变形”，不仅是“铁道正是在人的痛苦中完成的”具象化，更和接下来出现的“军国”的“巨大手臂”意象构成了邻近关系。也就是说，正因为“人的手臂在枕木下变形”，甚或化为“枕木”的一部分，所以，“军国手臂”才能不断制造伤痕又不断擦拭掉伤痕。当然，这是否是诗人的有意识表现，不得而知，但从诗作反复使用和身体有关的词语、意象，可以说，帝国日本的殖民地状况与人的身体之关系，是北川冬彦

特别关注的问题，并通过隐喻与换喻的错综转换，给予了独具特色的表现。诗作在以连绵的散文诗句充分渲染了军国铁道的“巨大”无敌之后，以空行的方式陡然转折，以最后的短短一行“朝着毁灭”突然收束，无论在诗艺表现还是在政治批判上，都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如果联系到此诗发表的时间，想到两年以后日本殖民者便在“满洲”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此诗所体现出的高度预见性和勇敢的批判精神，确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代结语

诗集《战争》所收《战争》一诗，最初刊于1929年3月的《诗与诗论》第3册，也是情绪激越的政治批判诗。全诗由三个长长的句子构成，首句借助无辜战死的士兵之口发出诘问（北川冬彦，1929e：1）：“假眼里给装饰上钻石又如何？干枯肋骨上佩上勋章又如何？”然后疾呼要和制造战争的资本和权力者斗争：“一定要把那大腹便便之上的头颅打碎！”在如此大胆地引口号入诗之后，诗作的最后一行，却通过酷烈斗争和孩子吹散蒲公英的意象组合，编织了一个颇为奇怪的情景：“何时才能把那骨灰放在掌上，像吹蒲公英那样吹散？”（北川冬彦，1929e：1）这个委婉的问句，其实暗示了政治愿望和愿望实现之间的距离，显示出了和直白的宣传鼓动诗的差异。

在《诗与诗论》发表时，《战争》是以“组诗”的面貌出现的，除了这首《战争》，另外还有六首排列在一起，但在收入诗集时，《战争》被单独抽出列为诗集的首篇，它和另外几首曾经有过的组合关系便没人提及。而从综合考察北川诗作的角度说，将这一组诗作为一个单元阅读，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观察点。在这组诗里，《战争》其实是个另外，其他几首都不是政治批判诗，而是殖民地日常生活情境的速写。比如《菱形的腿》：“这位支那的邮件配送人脚弯成了菱形。走下坂坡的时候，从那两腿之间看得见漂浮着帆船的灰色海。他随心所欲地工作。邮件，经常不来。但那绝不是因为他那弯成菱形的腿。为什么这样说呢？特别认真做的时候，他会把很多邮件送来。甚至别人家的信和包裹也掺杂在里面”（北川冬彦，1929e：9）。再如《花》：“埋在挨家偷来的花里，晒太阳像抹布似的支那老人很开心，很开心”（北川冬彦，1929e：10）。在这两首诗里，语言表现主体在面对殖民地的“支那人”的时候，优越意识跃然纸上。诗中的幽默、风趣，都来自其居高临下的俯视目光。这样的诗作出自《战争》作者之手，并和《战争》作为一组发表，这一现象其实包含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作为“艺术左派”，北川冬彦对“帝国日本”殖民扩张的批判，尽管是真诚而激烈的，但基本还停留在理念层面，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血肉和感觉。而能否意识到已经内在化于自身的殖民者经验，并自觉与之搏斗，是考验他的思想和诗艺的更大难题。

注释：

- ①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川村湊『異郷の昭和文学』、エリス俊子「畳まれる風景と滞る眼差し—『亜』を支える空白の力学について」（エリス俊子，2011. 畳まれる風景と滞る眼差し—『亜』を支える空白の力学について[J]. 立命館言語文化研究，22(4)：119-129.）、王中忱《蝴蝶缘何飞过大海—殖民历史、殖民都市与〈亚〉诗人群》（王中忱，2003. 蝴蝶缘何飞过大海—殖民历史、殖民都市与〈亚〉诗人群[J]. 视界，(12)：30-55.）、『帝国主義と文学』（王德威 廖炳惠 松浦恒雄 安部悟 黄英哲 編，2010. 帝国主義と文学[M]. 東京：研文出版.）中的『「東洋学」言説、大陸探検記とモダニズム詩の空間表現—安西冬衛の地政学的な眼差しを中心にして』部分等。
- ② 典型的例子是1949—1952年东京的河出书房邀集青野季吉、川端康成、伊藤整、中野重治等文坛名家编辑的65卷本『日本現代小説大系』，把「プロレタリア文学」和「モダニズム」分卷并列，对狭义的“现代主义”概念的确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 ③ 据本卷《序》后“附记”，伊藤从1951年5月着手写作『現代詩の鑑賞』，到1953年12月完稿，前后历时两年半。
- ④ 北川翻译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刊载于《诗与诗论》第4、5册，是节译。关于北川节译的主要着眼点，藤一也『北川冬彦 第二次〈時間〉の詩人達』第33—34页做了分析，可参照。
- ⑤ 北川这一看法有具体所指，是对杂志同人上田敏雄的批判。
- ⑥ 梶井基次郎，1929. 詩集〈戦争〉[J]. 詩と詩論，(6)：此文刊载于该刊版权页后所附的目录广告等资料第7页。
- ⑦ 藤直接引用了大冈信对《战争》的批评，并赞赏其“准确、猛烈”，但他承认诗集《战争》表现了一种“翻日本语系”的先驱性诗法，和大冈信认为《战争》毫无“前卫性”可言的看法有所不同。
- ⑧ 此处有关北川个人传记的叙述，主要参照《北川冬彦年譜》选自『日本詩人全集』第27卷（金井直等編，1968. 日本詩人全集 第27卷[M]. 東京：新潮社.）、《年譜 北川冬彦》选自『日本の詩歌』第25卷和櫻井胜美的『北川冬彦の世界』。
- ⑨ 北川冬彦是诗人的笔名，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叙述他少年时期的故事，也以后来通用的笔名称呼。
- ⑩ 参见『滿鉄附屬地における行政権に就て 嶺山政道教授所論 徐淑希教授駁論』，由满铁太平洋问题研究会1931年6月印行。
- ⑪ 据『經濟上より見たる 滿蒙の道路』一书记述，“从复州县城伸展出去的满铁铁路分为两条线路，一条到瓦房店，一条到得利寺。而作为政治及经济的通道，瓦房店路更为重要，日常来往交通频繁，且道路质量也非常之好。得利寺路在政治和经济上毫无价值，仅仅是为缩短距离，把有限的土特产搬运到此地，此外，去北方的人由此出发也比较方便，但因本地区之间人员往来不多，马车也很稀少”；但该书还写道，在得利寺附近，“距梁家坟三华里，有七八十户人家的大村落，设有巡警分局，房屋高大。”由此可知，和该村落仅距一华里的得利寺站之所以显得荒凉寂寞，是因其与当地大村落隔离的缘故。
- ⑫ 在《亚》第3号最后一页上，安西冬卫写道：“同人富田充、

北川冬彦、城所英一按照最初的约定在东京创办了《面》。接下来是瀧口武士，还有我”。从本期起，《亚》同人变成了安西与瀧口两人。

- ⑬ 参见北川冬彦『<詩と詩論>の思ひ出』,这是一篇文章,收在《昭和文学全集》所附的《月报》里,这种《月报》不是杂志,也不是书,单独印行,附在书里赠送。(安西冬衛等.1954.昭和文学全集 第47卷[M].東京:角川書店.)
- ⑭ 如真下滝吉所作、曾经非常流行的歌词『战友』中即有「赤い夕日の満州」这样的句子。参见甘ヶ崎彬『近代詩の誕生—軍歌と恋歌』的第246—251页(甘ヶ崎彬.2011.近代詩の誕生—軍歌と恋歌[M].東京:大修館書店.)。

参考文献:

- [1] 伊藤信吉.1954.現代詩の鑑賞 下卷[M].東京:新潮社.
- [2] エリス俊子.1994.日本モダニズムの再定義 — 一九三〇年代世界の文脈のなかで[A].モダニズム研究会.モダニズム研究[C].東京:思潮社.
- [3] 大岡信.1953.現代詩試論[J].詩学,(8): 16—24.
- [4] 川村湊.1990.異郷の昭和文学[M].東京:岩波書店.
- [5] 北川冬彦.1925.三半規管喪失[M].東京:至上芸術社.
- [6] 北川冬彦.1926.体温器と花[M].東京:ミスマル社.
- [7] 北川冬彦.1929a.新散文詩への道[J].詩と詩論,(3): 257—260.
- [8] 北川冬彦.1929b.壊滅の鉄道[J].詩と詩論,(4): 118.
- [9] 北川冬彦.1929c.鯨[J].詩と詩論,(4): 120.
- [10] 北川冬彦.1929d.詩人の眼[J].詩と詩論,(6): 33—35.
- [11] 北川冬彦.1929e.戦争[M].東京:厚生閣書房.
- [12] 北川冬彦.1951.北川冬彦詩集[M].東京:宝文館.
- [13] 北川冬彦 安西冬衛 北園克衛 春山行夫 竹中郁.1968.日本の詩歌 第25卷[M].東京:中央公論社.
- [14] 桜井勝美.1984.北川冬彦の世界[M].東京:宝文館出版.
- [15] 澤正弘.1994.詩史の断層—近代から現代へ[A].澤正宏 和田博文.都市モダニズムの奔流[C].東京:翰林書房.
- [16] 大連日本民生署編.1928.大連要覧[M].大連:大阪屋号書店.
- [17] 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臨時經濟調査委員会編.1929.經濟上より見たる 満蒙の道路[M].大連:南満洲鉄道株式会社臨時經濟調査委員会.

- [18] 西原和海.1996.大連のモダニズム[A].澤正宏 和田博文.都市モダニズムの奔流[C].東京:翰林書房.
- [19] 原田勝正.1981.満鉄[M].東京:岩波書店.
- [20] 樋口覚.1996.北川冬彦論—北川冬彦問題[A].澤正宏 和田博文.都市モダニズムの奔流[C].東京:翰林書房.
- [21] 藤一也.1993.北川冬彦 第二次「時間」の詩人達[M].東京:株式会社沖積社.
- [22] 李百浩.1997.満鉄附属地の城市规划及其特征分析[J].同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 91—96.
- [23] 謝忠宇.2009.満鉄附属地学校教育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Language, Experience and Polysemy in Modernism —with a Focus on Kitagawa Fuyuhiko's Poetry in Early Period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Modernism Poetry have been long considered as the experimentation of language form in a narrow sense. The paper argues that Modernism should be redefined in the extensive and sophisticated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history, which is the basis for the re-exploration of Kitagawa Fuyuhiko's poetry. 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Fuyuhiko's artistic left standpoint and his supportive attitudes on colonial expansions of Empire Japan. Modernity of Fuyuhiko's poetic techniques and his "avangardeness" are the result of such a tense relationship.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at Fuyuhiko's poetry writing has been restrained and limited by his colonial life experience.

Key Words: Modernism; colonial experience; Kitagawa Fuyuhiko; artistic left